

《管子的玄思》中阿梅丽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Amélie's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宋 歌 (Song Ge)

内容摘要：比利时小说家阿梅丽·诺冬的《管子的玄思》讲述了一个在日本出生的比利时女孩阿梅丽对伦理身份的探寻与选择的过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导致了阿梅丽的身份危机，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对立构成了她模糊而分裂的独特身份。想要解开身份之谜，阿梅丽必须正视现实、认知自我，通过个人努力在日本公民身份与比利时公民身份之间进行伦理选择。《管子的玄思》反映了部分比利时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关于伦理身份观念的思考。

关键词：阿梅丽·诺冬；身份困惑；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宋歌，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文学。

Title: Amélie's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Abstract: Belgian novelist Amélie Nothomb's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Amélie's pursuit and choice of her ethical identity. The crash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leads to her identity crisis. The fus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form an ambiguous, divided and unique identity of Amélie. In order to clear up her identity confusion, Amélie must face the reality, recognize herself as a multicultural identity, and make a painful choice of her ethical identity between Japanese and Belgian.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reflects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some Belgians' ethic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a multi-cultured background.

Key words: Amélie Nothomb; identity confusion;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 Song Ge, Ph.D. stud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is mainly interested in researches on con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Email: leosongge@163.com).

比利时女作家阿梅丽·诺冬 (Amélie Nothomb, 1967—) 是当代法国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她先后创作小说 28 部。她的主要作品有《杀手保健》 (*Hygiène de l'assassin*, 1992)、《午后四点》 (*Les Catilinaires*, 1995)、《诚惶诚恐》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1999)。《管

子的玄思》(*Métaphysique des tubes*, 2000)是作者阿梅丽·诺冬的第二部关于日本的作品。这本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角阿梅丽人生最初五年的时光,阿梅丽的成长轨迹与作者阿梅丽·诺冬几乎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女主角阿梅丽所面对的伦理困惑与伦理选择能够反映作者阿梅丽·诺冬的成长经历。阿梅丽出生在日本并在那里长大,起初作为“管子”¹的她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概念,当祖母的巧克力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比利时公民身份时,阿梅丽陷入关于伦理身份的困惑,同时也开始了对伦理身份的追寻与选择。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通过对主人公阿梅丽的分析,考察以作者阿梅丽·诺冬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人的伦理身份及伦理选择的嬗变。

一、阿梅丽伦理身份的困惑

人的伦理身份包括自我意识、国籍、性别、社会阶层,有时人们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需要寻找某种参照物,如:人们会通过自己与他人生理特征的对比来确认自己的身份(通过肤色与发色来确认人种,通过生殖器官来确认性别)等。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观点。《管子的玄思》中女主角阿梅丽想要确认自己的身份,但她又面对着身份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比利时公民身份与日本公民身份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阿梅丽第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从无意识的婴儿状态到确认自己比利时身份的阶段。以管子身份出现的女主角阿梅丽与大多数新生儿不同,她既不哭也不闹,除了基本的进食与消化外,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不过祖母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她的比利时巧克力使管子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管子变成了比利时女孩阿梅丽。当谈到白色巧克力的意义时,阿梅丽说道:“白巧克力给了我一个身份,也给了我回忆”(24)。²阿梅丽开始对周遭世界有了意识,并感知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关于自己的确切身份,她却是茫然的。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当一个6-18个月的婴儿在镜中认出自己的影像时,婴儿尚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动作,还需要旁人的关照与扶持。但是,他却能够认出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在比利时祖母到来前,阿梅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像未接触镜子的婴儿。当她看到祖母带来的比利时白巧克力时,她意识到了镜中人的存在,但仍然疑惑镜中人的身份——是他人?还是自己?此时,扮演“旁人”角色的是祖母,在她的鼓励下,阿梅丽终于成功吃掉了整个巧克力,同时也确定镜子中的人物是她本身。她不再是“管子”,而是比利时女孩阿梅丽。在“镜像阶段”,

1 阿梅丽在出生之时以“管子”自居,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她的唯一活动是张开所有必要的口子进行吞咽与消化,像一根没有情感活动的“管子”。因此,阿梅丽将从出生到身份意识形成前的自己称为“管子”以强调自己只具备基本的进食与消化功能,而对周围世界毫无认知的状态。

2 本文有关《管子的玄思》的引文均来自阿梅丽·诺冬,《管子的玄思》(深圳:海天出版公司,2002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白巧克力被视为身份之旅开启的起点，它扮演了比利时文化载体的角色，是自我精神分析的关键。通过这面镜子，阿梅丽意识到自己现实中的伦理身份——比利时公民身份。阿梅丽以她的比利时公民身份在祖母营造的比利时文化环境中舒适惬意地生活，并未对自己的比利时公民身份产生怀疑，直到祖母去世。作为婴儿的阿梅丽对周遭事物的感知有限，她只能感知到周边的小环境——住所内部以及亲人。正如尚必武所说：“虽然儿童完成了人类的生物性择，具有人类的外形，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一定的伦理意识，很难完成自己正确的伦理选择，难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认同”（尚必武 74）。

阿梅丽第二次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是在日本保姆西尾太太到来之后，这说明她已经进入有意识的儿童阶段。此时的阿梅丽对周遭事物有了强烈的感知，因为她需要与西尾太太更融洽地生活以及适应周遭的大环境——家以外的世界及日本文化。此时的阿梅丽并不拥有日本国籍，但是她对日本公民身份的认同感逐渐加强，并最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日本人。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为何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对阿梅丽而言，她所面对的伦理环境影响了她的伦理选择。她进行的伦理选择的原因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阿梅丽主动进行伦理选择来适应当时的伦理环境，如面对充满敌意的香岛太太，阿梅丽尝试做一个乖巧的日本人来讨好她以便于与其和谐生活。另一方面，出生于异国的阿梅丽并没有选择伦理环境的权利，远离祖国使得比利时文化对她的影响有限，而由日本保姆西尾太太营造的日本文化环境却时时刻刻影响着她。

至此，阿梅丽的比利时公民身份与日本公民身份均已在她的意识中确立，两种身份的碰撞与融合为阿梅丽带来了伦理困惑。在《管子的玄思》中，阿梅丽的伦理身份是围绕“想象与现实”建立的。阿梅丽得到来自日本保姆西尾太太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经常依偎在西尾太太的怀中，听她唱歌、讲故事。西尾太太的关怀营造了良好的日本文化氛围，而阿梅丽对这种文化氛围产生了好感。为更好地融入日本文化，阿梅丽尝试成为一名日本人，如：积极学习日语，日语的使用甚至在母语法语之前。可以说，阿梅丽在无意间获得了想象中的伦理身份——日本公民身份。除了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之外，阿梅丽还具有第二层伦理身份，即现实中的伦理身份，即：通过祖母带来的比利时巧克力而意识到的比利时公民身份。起初，阿梅丽对周遭漠不关心，“她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等，什么都察觉不到，什么都不拒绝，对什么都不感兴趣”（1），她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无法认知自己的伦理身份。但是，当祖母将巧克力放入阿梅丽嘴中时，奇迹出现了，巧克力的甜味给阿梅丽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她感受到了快乐，这种感官上的快乐使她开始对周围的

世界有了反应，而巧克力的属性（比利时特产）唤醒了她的，并使她意识到自己是阿梅丽，一个比利时女孩。

想象构成的伦理身份和现实中人物的伦理身份之间，并不是互相平行独立，而是存在着交叉和错位。从想象的角度来看，日本公民身份是指阿梅丽是一个日本人，她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并深爱着这个国家，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不受比利时文化影响。作为出生在东方国度的西方人，阿梅丽的生物学特征本应很明显地使她意识到自己与真正日本人的区别，然而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赋予了阿梅丽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识，这种意识使得阿梅丽主动将自己与其他比利时人区别开来。她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是比利时人，除了她本人，因为她是日本人。由日语歌曲、鲤鱼旗以及能乐等构建的日本文化环境使阿梅丽获得了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而这个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又使阿梅丽很好地适应现实中的伦理环境。但是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身份来看，阿梅丽是比利时公民，她不仅流淌着比利时人的血液，而且在法理上也拥有着比利时国籍。虽然阿梅丽以一个比利时公民的身份在日本生活，但实际上陪伴她成长的是《丁丁历险记》与《圣经》，然而西方读物的文化影响没有阻止她表达对于日本公民身份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源于对西尾太太的崇拜与依赖，崇拜和依赖加强了对日本公民身份的归属感，削弱了比利时文化的认同感。对于比利时公民身份的忽视与日本公民身份的认同造成了现实与想象的冲突，从而引发了关于伦理身份的困惑。如果她接受想像中的伦理身份，那么就要忽视自己的比利时特征，不承认自己的比利时血统，忽略自己西方人的容貌，并尽可能不离开日本。因为离开日本意味着远离日本文化的熏陶，而对于只有五岁的阿梅丽来说，在缺少日本文化支撑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以日本公民身份生活是不现实的。血统与容貌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否可以长期在日本生活是由父亲的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当接到比利时政府的调任通知后，阿梅丽一家在日本的生活随即宣告结束。所以，她将不得不以现实中的伦理身份——比利时公民身份继续生活下去，这意味着她将选择面对既不了解也缺乏感情基础的祖国及其文化。但是，比利时对她来说更多地是一个符号，在十七岁之前她从未踏上祖国的土地，除了法语，阿梅丽身上的比利时元素并不明显，因此尽管比利时公民身份是阿梅丽现实中的伦理身份，但这是一种不完整的伦理身份，不完整是因为阿梅丽并不了解这一伦理身份背后文化及其意义。

在《管子的玄思》中，阿梅丽是事实上拥有比利时公民身份的人，但却认为自己拥有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交叉错位的伦理身份使她陷入伦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离开日本使她不得不做出伦理身份选择，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公民身份的不舍与对比利时公民身份的排斥使得她难以做出伦理身份选择。这种伦理两难正是作者阿梅丽·诺冬希望通过小说表达的，即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人如何进行伦理身份选择。正如长期从事阿梅丽·诺冬作

品研究的 Laureline Amanieux 所说,“小说家经常以双重身份示人,其中一个身份是比利时人,而另一个则是日本人”(Amanieux 279)¹。

二、阿梅丽伦理选择的三阶段

面对伦理身份的困惑,阿梅丽需要进行伦理身份找寻并做出伦理选择。“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定位是不清晰的,那么他就无法感知自己的存在,继而很难享受正常人的自由与权利。阿梅丽身份找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两种伦理身份之间徘徊,这是一种对心理上的归属感的追求。

对于阿梅丽来说,心理上的归属感的追求过程就是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伦理身份,阿梅丽的伦理选择过程分为三阶段:首先是伦理身份即社会身份找寻及确立阶段。“由于社会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因此社会身份的性质是伦理的性质,社会身份也就是伦理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在出生之时,阿梅丽就“像圆柱体一样保持绝对的宁静,她过滤着外部世界,却不留下任何东西”(3)。但是,在祖母及比利时巧克力的引导下,阿梅丽血缘上的伦理身份得到确认,她意识到了自己是比利时人的事实。而当祖母去世后,两个因素影响了阿梅丽对于血缘上伦理身份的认知。一是日本保姆西尾太太开始照顾阿梅丽,她在阿梅丽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启蒙教师的作用。阿梅丽两岁半时,她意识到当一个日本人意味着被西尾太太宠爱。而且,在西尾太太的影响下阿梅丽逐渐被日本文化所吸引并沉醉其中。为此,她说道:“如果说我懂得日语比懂得母语早,这并不是偶然的,对某人的崇拜会使我学某人的语言”(42)。二是作为外交官的父亲对于日本文化的喜爱也影响了阿梅丽对于伦理身份的选择。比利时驻日本外交官是父亲在亚洲的第一个职位,“这个三十岁的年轻外交官对这个国家一见钟情。日本成了并且将永远成为他生活中的所爱”(63)。西尾太太与父亲无疑影响了阿梅丽的伦理身份选择。可以说,作为一个成长在日本的比利时人,阿梅丽从出生那一刻起注定要面对身份定位不明确的问题,这种不明确导致了缺乏对于这个世界的归属感,而复杂的身份找寻经历正反映了阿梅丽寻找一种心理归属感的努力。

其次,阿梅丽伦理选择的第二个阶段是伦理找寻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阶段。一次偶然的机会,阿梅丽了解到另一位日本保姆香岛太太关于日本与西方关系的想法。作为日本旧贵族的一员,香岛太太把自己的废黜归罪于白人,因此她对所有的白人持仇视态度。与雇主一家关系良好的西尾太太也被她视为与敌人媾和的叛徒。阿梅丽——一位自认是日本人的西方人,认为香岛太太会像西尾太太一样疼爱她,但香岛太太的言论使她隐约意识到

1 凡未特别注明,均出自笔者自译。

一部分日本人对西方人抱有的敌意。作为一个比利时人，她始终是日本人眼中的敌人，因此无论她怎样努力做得像一个日本人，她都不会被香岛太太所接受。阿梅丽对于心灵上归属感的寻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针对香岛太太的言论，西尾太太选择与香岛太太进行理论，她强调自己受到阿梅丽一家足够的尊重与爱意，认为自己已经成为阿梅丽家庭中的一员。西尾太太的态度使阿梅丽明白，尽管在伦理选择时遇到一些困难，但只要她真心喜爱日本文化，她仍然可以在这位启蒙教师的呵护下继续做想象中的日本人。

最后，是阿梅丽伦理选择的第三个阶段，即在伦理身份冲突中做出选择的阶段。当得知全家必须离开日本时，她意识到将会发生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她将会失去日本公民身份，而失去一个伦理身份意味着她可能需要获得另外一种伦理身份以便在别的国家继续生活下去。阿梅丽不得不被动地做出选择，为此她尝试以跳水自杀的方式表明自己拒绝做出选择的姿态——“这是我的国家！如果让我走，我就去死！”（87）。从对两种伦理身份的认知，到对日本公民身份的认同，直至对比时居民身份的排斥，阿梅丽在不同的成长时期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

当谈到自己的伦理身份时，作者阿梅丽·诺冬说道：“我是无国籍人士”（220）。她笔下的同名女主角阿梅丽和她一样给读者留下无国籍人士的印象。当阿梅丽要离开日本时，她选择了被忽视的比利时公民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对现实进行妥协的结果，因为她已有的血缘伦理身份和即将面对的伦理环境决定了她将无法以日本公民身份继续生活。所以，她不得不接受自己真实的伦理身份，而这个伦理身份是不完整的，因为她并不了解这个伦理身份背后的真正意义。

三、作者的伦理意图

经过了复杂的伦理找寻过程，阿梅丽最终做出了伦理选择——做一名不完整的比利时人，而不完整的比利时人这一形象符合作者阿梅丽·诺冬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可以说阿梅丽这一人物的塑造正反映了作者的伦理意图，即：在生活中，伦理选择高于其他选择（如生存选择），且伦理选择问题往往是与文化差异问题紧密相连的。

在伦理身份找寻过程中，阿梅丽所处的伦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自身伦理身份的认知及选择。她生来就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比利时公民身份，只是在成长环境的影响下忽视了自己已有的伦理身份，并尝试着选择了日本公民身份，选择做一名想象中的日本人。阿梅丽对自己伦理身份的认知和选择高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优渥的家庭条件使得生存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而作为在异国出生并在不同国家成长的外国人，阿梅丽常常被伦理身份的不清晰所困扰。阿梅丽的遭遇正反映了以作者阿梅丽·诺冬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无国籍人士”所面对的问题，即：现实伦理身份与想象伦理

身份的冲突。作者阿梅丽·诺冬正是通过对阿梅丽伦理身份找寻的过程来展示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个人是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

作为从小在外国长大的“无国籍人士”，作者阿梅丽·诺冬的作品往往着眼于多元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带来了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管子的玄思》的女主角阿梅丽身上就具体化为比利时公民身份与日本公民身份的冲突。一方面她喜爱日本的食物，听日本的歌曲，与日本人一起生活，另一方面她又无法理解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敌意以及看到她溺水时的冷漠。可以说，作者阿梅丽·诺冬不但希望通过阿梅丽为无国籍人士的伦理身份问题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而且也希望读者可以将部分目光聚焦于引起伦理身份问题的根源即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上。透过文化差异展示伦理身份问题，又通过伦理身份问题折射出文化差异在身份找寻过程中的重要性始终是作者阿梅丽·诺冬自传体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意图。

在小说结尾处，阿梅丽试图通过溺水自杀使时间停止在离开日本之前，“我不再搏斗了。我被催眠了，掉在了水池中”（104）。如果说死亡可以让阿梅丽永远拥有想象中的日本公民身份，她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当回忆起濒临死亡的时刻，阿梅丽说道：“我在那里一动不动，四周又恢复了宁静，我的忧虑消失了，我感到十分舒坦”（104）。一方面，她担心离开日本，离开意味着失去日本公民身份，另一方面，离开日本意味着重新面对陌生的比利时公民身份，这种未知也给阿梅丽带来了恐惧。因此，在日本公民身份与比利时公民身份之间，她倾向于选择前者，但后者只是面对新的伦理环境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阿梅丽还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明白：人生的道路是否最好于1970年8月底在鱼池中停住？”（111）对她始终持排斥态度的香岛太太救了企图自杀的阿梅丽，而比利时女孩也选择了放弃抵抗，她的第一次——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唯一的一次自杀就这样结束了。自杀失败使阿梅丽意识到拒绝离开是徒劳的，所以她最终不得不选择了不完整的比利时公民身份。当谈到她是不是恨别人救了自己的命时，阿梅丽说道：“是的。但同时我是否因为被及时救上来而感到宽慰？是的。所以，我选择冷漠”（111）。阿梅丽的伦理选择是为了适应新的伦理环境而被动做出的，这违背了她自身的意愿，因此不完整的比利时公民身份注定是一次暂时性的伦理选择。作者阿梅丽·诺冬在后续作品中的描述也验证了这一说法——成年后的阿梅丽选择重返日本，她再次尝试着做一名日本人，即再次在日本公民身份与比利时公民身份之间进行了伦理选择。

作者阿梅丽·诺冬区别于传统法国文学家，她用自传体小说的形式将读者的目光转向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聚焦于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自己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诠释了一个比利时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问题的思考。《管子的玄思》正是作者阿梅丽·诺冬所有作品中最能反映她对于伦理身份这一问题理解的作品。在一次访谈中，她曾说道：“在

某些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是日本人”（143）。作者阿梅丽·诺冬从小远离家乡，生长于外国并深受当地文化影响，在《管子的玄思》中她为女主角阿梅丽构建了日本人与比利时人的双重伦理身份。而阿梅丽关于伦理身份的质疑、找寻与选择的经历，实际上反映了作者自身的伦理身份找寻过程。现实中的伦理身份与想象中的伦理身份间的矛盾、血缘伦理身份与异国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伦理身份的矛盾等涉及到的伦理困境，正是作者阿梅丽·诺冬试图借助小说创作想要探讨的问题。“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2）。作者阿梅丽·诺冬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于找寻自身伦理身份的诉求。通过描写祖母的巧克力、日本保姆的陪伴、溺水自杀等一系列伦理事件，突出展示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下的个人所面对的身份确认与伦理选择上的困难。通过阿梅丽向世界发出一个希望关注“无国籍人士”身份问题的呐喊，给读者带来了诸多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个人成长和伦理身份选择的思考。

Works Cited

- Amanieux, Laureline. *Le récit siamois: Identité et personnage dans l'œuvre d'Amélie Nothomb*.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1(2010): 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阿梅丽·诺冬：《管子的玄思》，许永健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
- [Nothomb, Amélie. *Métaphysiques des tubes*. Trans. Xu Yongjian. Shenzhen: Haitian Press, 2002.]
- 尚必武：“成长的不能承受之轻：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外语教学》4（2014）：71-75。
- [Shang Biwu.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Growth: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hoice in *The Cement Garden* of McEwa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4(2014): 26-34.]